一、許地山和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許地山（1893-1941）祖籍廣東揭陽，生於台灣台南，寄籍福建龍溪（今漳州市）。1917 年，考入燕京大學文學院；1922 年，許地山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宗教史和比較宗教學，1924 年獲文學碩士學位，後來轉往英國牛津大學研究宗教史學、印度學、梵文等。1935 年，得到胡適的推薦，出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主任，對中文學院的改革貢獻良多。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的成立

香港政府自省港大罷工後，提倡傳統的中文教學，緩和反英的情緒和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時移勢易，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八股文，脫離了白話文運動的時代潮流。許地山因而接任系主任一職，改革系內課程，引領香港中文教學的進步。

1925 年，香港發生史上規模最大、歷時最長、反對英國殖民地統治的省港大罷工。當時反英情緒高漲，因此與任何英國有關的物事，都備受華人的責難，以至在香港英文學校的華人學生，唯恐被人詛咒虐待而不敢上課。為了免除香港華人社會受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提倡學習傳統中國典籍語文，既維護了華人的文化自尊，亦使香港與當時中國白話文運動進行隔離，從而減少受其民族主義的影響。因此，提倡傳統中文教育，出現客觀的需要。另一方面，在省港大罷工發生期間接任港督的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熱愛中國文化，通曉粵語和國語，將粵省民謠《粵謳》翻譯成英文。為了緩和反英局勢的需要，以及改善當時香港學校缺乏中文教育的情況，金文泰在 1926 年 3 月成立漢文中學。

香港大學成立之初，中文只是一年級的普通選修科目，由前清太史賴際熙和區大典，分別教授中國史學和經學。在創設漢文中學後，為了進一步發展香港的中文教育，金文泰和香港華人紳商討論，計劃在香港大學增設中文學系。1927 年，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成立，由賴際熙擔任首任系主任。金文泰更促成英國退還中國的「庚子賠款」，作為發展中文學院之用。然而，賴氏等前清遺老教授的中文，以前清的八股文為宗，偏重記誦之學，與現代大學教育的發展脱節，更遠遠落後於中國內地現代中文教育的發展。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課程的改革，成為推動香港中文教育向前發展的重點，而許地山便成為當中的關鍵。

（蔡思行：《香港史 100 件大事》，上冊，頁 260-261。香港：中華書局，2012 年。）

胡適推薦許地山執掌中文系

1935 年 1 月，作為近代中國「白話文之父」的胡適，前往香港大學接受榮譽博士的榮銜，成為改革中文學院的契機。當時香港大學校長賀耐（Sir William Woodward Hornell）便在頒發學位給胡適時說：「胡適博士今天的蒞臨，正好作為證言，證明他相信本大學可以和將會擔當它的角色，雖然是渺小的，即是中國文化的復興。」

許地山（轉載自《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歷史圖錄》）

當時中文學院對胡適提倡白話文的主張，意見頗為矛盾。學院講師區大典和羅憩棠，都認同翻譯西書和拯救 85% 的文盲，需要使用白話文，但同時認為白話文學是洪水猛獸，禍害深遠。不論中文學院內部的意見如何，香港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予胡適，正是認同其白話文改革主張的表現。同時港大希望聘請他主持文學院，但被婉拒。

許地山編著作品書影

當時擔任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主任的陳君葆，在 2 月 19 日的日記，記錄了當時中文學院科務會議，就聘請美國芝加哥大學比較文學博士陳壽頤擔任中文系主任的事宜進行討論。陳君葆贊同聘請陳壽頤：「在我倒非常歡迎他來，舊的東西，實在太缺乏方法和眼光；增加點新血分，強心劑以外當然還有別的好處！」

陳君葆所說的「舊的東西」是什麼呢？當時英文系教授科士打（Prof. Lancelot Forster）在 3 月的信函中有進一步的論述：「廣州和北京之間有重大的鴻溝，這是因為北京領新文化運動之先，而胡適正是其領袖。廣州在陳濟棠將軍的控制下，因此南方對這運動表現抗拒。這個運動是反對中國傳統典籍以至中醫術。現在陳（壽頤）博士來到此處（香港大學），代表我們認同進步的運動，其目的是將國語作為拯救語文的丹藥，雖然這不代表要完全排除古文，而接納古文的前提在於它是學習中文的最終目標。顯然，未來的發展必須跟從這樣的路徑，而現在（中文教育）制度註定失敗，在於有這類人——舊翰林學人——他們很快便不合時宜。」賴際熙等翰林出身的前清士

人，被視為改革中文學院的絆腳石。

當時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已決定聘請陳壽頤為系主任，但科士打認為陳接受聘任的機會不大。原因在於當時原定胡適在廣州中山大學演講，但由於胡適在香港發表演說中有「廣州為革命策源地，乃有提倡讀經之舉，我真不懂」之語，因此臨時取消歡迎胡適的儀式。當時廣州方面十分擔心香港大學聘請陳氏後，會成為中文研究的中心。陳氏聽聞此事，自然不欲成為廣州方面的眼中釘，因此最終不接受港大的聘任。

當時港大聘請中文系系主任有幾個條件：第一，有國際認可的高級文科學位；第二，有十年以上的大學授課經驗；第三，是國學專家，懂得國語、粵語和閩語；第四，通曉英文。當時胡適向港大負責人說：「在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中，表現好、值得佩服的，除了二周〔周樹人和周作人〕之外，許地山是第三名。」因此極力推薦許地山出任港大中文系系主任。以許地山的條件，確實符合港大的條件：分別在 1924 年和 26 年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和牛津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在 1927 年起先後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中山大學任教印度哲學、人類學等科；精通英文，過曉國、粵、閩語，更懂得梵文，對各宗教風俗和民俗都有湛深的研究。6 月 8 日，中文學院科務會議，正式通過大學校董會的決議，聘請許地山為中文學院主任。

（蔡思行：《香港史 100 件大事》，上冊，頁 261-263。香港：中華書局，2012 年。）

香港大學中文部的改革

著名作家許地山氏，南來任香港大學教授職後，以港大之「中文部」有改組之必要，乃特草將「中文部」改為「中國文史學系」之計劃書，交港大副校長韓尼路察核，記者昨查悉香港大學為討論改組中文部事，已定今晨十時，由韓尼路召集會議，其計劃為「港大中文部」於改為「中國文史學系」後，可將該系分為四部（即普通文學部、文學部、歷史部、與哲學部），又查港大中文部之目下情形，係由許地山碩士任教授，區太史任經學講師、羅

芾棠舉人任歷史講師、崔百越秀才任國文講師、陳君葆任翻譯講師，學生則只得數人。區羅崔陳各講師，將於本學期末滿職，屆時各講師留任與否，將有多少變動，現港大當局擬聘請北大教授陳受宜，或燕京大學教授陸侃如到港任講師，以求對於中國文史方面之教授方法，能有相當之改善，至於許地山教授在港大之任期，業已決定為三年，許氏對記者談話，謂港大學生之中文程度，雖尚未達至一般水準，但並不是無可挽救。大約一兩年後，當可趕上一般水準，目下港大之藏書，關於中國問題之英本書籍頗豐，然中文本之藏書，則異常缺乏，兄弟將要求港大當局指撥款項專為購藏書籍之用，俾學生方面、同時亦是教授方面，可有巨量之參考書籍而得助益云。

（〈討論改組中文部事，許地山教授將出席〉，載於《華僑日報》，1935 年 10 月 14 日。）

本港香港大學設立中文部，已有多年，該校當局為求改善中文部起見，去夏特聘北京大學教授陳受宜、及前任廣州中山大學嶺南大學教授、現任北平輔仁大學教授客肇祖南來。研究香港大學中文部應如何改組之問題，迨後港大又於本學期聘請我國之名學者許地山碩士，到校任中文部教授。查許氏履任後，已草有改組中文計劃書，呈交港大副校長韓尼路察核，同時陳容兩教授，亦已將港大中文部之應改革意見書寄到，該書內容，對於港大中文部應改革者計提有十點。一、港大中文部應保持其原有過去之計劃、教授中國語言、文字、歷史、哲學。港大之中文部原照廣雅書院之學制，分科注重歷史。今後應注重用歷史與科學之見地，研究歷史，而不應廢除經史之教授，但要加以稍稍之改善。二、應該在中文部聘請教授與講師等共五人。計劃教授一人，講師三人、導師一人（許教授語記者稱，現港大中文部已有教授等五人，與陳容兩教授之意見書相符）。三、港大中文部應該除教授普通科目外，有專門之學科翻譯一項，科目應有減少教授期限之必要（查港大中文部四年皆有翻譯科目、陳容兩教授意則應減少兩年有翻譯科目）。五、所有屬中文部之學生、教授與講師，應鼓勵其有專習一種科目（如文學、哲學、或歷史之必要），同時需注意學生得入研究一個時代之歷史、哲學、或文學。六、應用國語教授，學生用文言或語體文寫文章則可隨自由，學生應注意近代語言文學。七、應組織一顧問部，並應與中國文化中心有相當聯繫。八、「漢口俱樂部」藏書，應移存到半山圖書館。九、中文部應該加入馮平山圖書館委員。十、港大當局對於中文部之進行事宜，應向校外之專家，或學者徵求意見。而將實現改組後之「中文部」則依照許氏之獻議，易名為「中國文史學系」。

（〈香港大學改組中文部，決採許地山之獻議進行〉，載於《華僑日報》，1935 年 10 月 16 日。）

柳亞子對許地山的回憶

一九四零年十月，我初到香港，聽見人家講起一種特權的老爺們，對於新文字正在造謠污衊，無理迫壓，心中甚為憤憤不平。隔不了幾天，中國文藝界抗日協會香港分會有一個茶話會招待我，當主席的是許地山先生，他要我講話，我就把這不平的話都講了。許先生笑道：「一切正中下懷，造反的就是我。」原來，許先生正是香港新文字學會的主要人物，我當時還沒有知道呢。

以後，我和許先生相敍過幾次：一次，是在他家中面壁齋的茶敍；另一次，是在中英文化協會的年會。茶敍那一天，有十幾位朋友，許先生和許夫人招待殷勤，大送其茶點，喝喝啖啖，心中非常高興。在年會的晚餐席上，大家講的是英語，而我一句也不懂，覺得相當的窘。幸虧許先生是知道我的，他和我同席，便把我的位置排在他自己和許夫人的中間，他倆陪我講中國話，破除我的寂寞。不然，我那一天晚上真是變成啞巴了。還有一次，是葉淺予先生和戴愛蓮女士的婚禮，地點在保衛中國同盟，許先生是證婚人。那一天，國母孫夫人也出席參加，到的有三十餘人，非常熱鬧。來了，全體拍了一張照片，我和許先生站在一起，這照片現在我還保存着，也可以算是一個紀念吧。

最後一次，也是一個茶話會，大家預備為皖南事件作一個公正的表示。許先生匆匆而來，又匆匆而去，他說他另外有要緊的事情。當大家正在推敲

着宣言的字句時，許先生拿起毛筆來先簽了一個名，便揚長出走了。許先生慈祥的態度，和正義感火熱的心腸，在現在閉了眼睛，還是可以想像出來的。然而，又哪裏知道這一次便是我和許先生最後的相見呢！那一天的日子，我記還得，正是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

（柳亞子：〈我和許地山先生的因緣〉，《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歷史圖錄》，頁 60，2007 年。）

學生對許地山的回憶

地山先生逝世後的第四天，我回到了先生在中文學院的課室。

先生的坐椅空着，門虛掩着，窗外的繁花，先生曾經指點着告訴我它們底名字的，還是一般的盛開；南英先生手書的澉湖塾約，先生曾跟我解説他底意義的，依然掛在壁上；未寫完的文字等候着完成，未開的信件等候着拆閱；然而，我們的先生呢？他已經得到永恆的安息，他是永遠不會回來的了。

我最後一次在這課室裏見到先生，是在今年快放暑假的時候。先生發還我的課卷，和我討論一年內所作的功課，並且告訴我：暑假應當多讀點書。先生那天説話很多，精神也很好，我總以為以後還多着聽先生講書的日子，哪裏知道，他竟去得這般快呢？早知這樣，我就應該把先生當日所説的每一句話，盡情記取了。

我環望室中。一切的東西都在默默地訴説着同一個故事——先生怎樣獻身教育，和死亡奮鬥的故事。這故事的意義是深長的。

從最近幾年來，先生在港大擔任的課程，每週總在二十小時以上。所講授的科目有十多個。只要是對同學們的進修有幫助的功課，他總不惜減少自己休息必要的時間，騰出工夫來講授的。一年級的同學聽不懂國語，他來擔任補習，一二位同學幾乎好奇地要學一點梵文，他特意在下午趕回來教授。你開口要跟他讀那一門功課，他從不推辭。這種為大眾的利益打衝鋒的工作，暗地威脅他的健康，他也知道，可是他還是這樣做下去，不肯放鬆，他的天性就是喜歡幫助人，為了學生，他不惜犧牲自己！

二十多個鐘頭的課程，在馬虎一點的教師，也許對付還不很難，但先生卻是最恨敷衍了事的。他對每一課都認真預備。有幾次我到中文學院上課，比預定上課的時間早，已經看見先生在課室裏預備，翻抄上課時需用的參考書籍了。在上課的時間，有時偶爾遇着一二個意義不明的詞，先生也從來不肯放過，總要找到解釋才休的。即使學生們自己鬆懈，他還是那樣認真。這些工作，不知耗去了他多少時間和精神。

（金應熙：〈悼許地山師〉，《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歷史圖錄》，頁 61，2007 年。）

問題討論

1. 香港大學中文系成立於何時？最先由誰執掌系務？
2. 在許地山執掌下，中文部有哪些方面的改革？
3. 根據金應熙的回憶，許地山的教學有什麼特色？